2013

第一辑

中国经济与管理

颜廷君　顾建光　主编

厉以宁　发展优势和“红利”的创造
迟福林　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
鲍宗豪　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核心竞争力
鲁培康　企业立信境界管理模式
莫　言　会唱歌的墙
颜廷君　新文化生态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经济与管理

颜廷君　顾建光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与管理.第1辑2013年,/颜廷君,顾建光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ISBN 978-7-208-11447-0

Ⅰ.①中… Ⅱ.①颜… ②顾… Ⅲ.①中国经济-经济管理-文集 Ⅳ.①F1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9815号

责任编辑 王舒娟 于力平

封面装帧 王小阳

中国经济与管理2013年

(第1辑)

颜廷君 顾建光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6.75 插页4 字数256,000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1447-0/F·2171

定价68.00元

中国经济与管理

2013

第一辑

前　言

没有梦想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停止过梦想！中国领先世界几千年，大唐盛世是世界的梦。近代中国落伍了，历经屈辱与坎坷，但复兴的梦想藏龙般虬伏在炎黄子孙生生不息的血脉中，像咆哮的黄河、浩荡的长江不舍昼夜。今天，我们喊出“中国梦”，这个声音让人振奋，也让人酸楚，它在中华民族的心中压抑了太久太久，它是宣泄，也是宣言！

中国梦，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之梦，是人民幸福、社会和谐之梦。实现中国梦需要走正确的道路，需要依仗国家的力量，更需要全体中国人的担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全国人民的智慧和汗水托起中国梦！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编辑出版《中国经济与管理》丛书是“匹夫”的圆梦之举。我们拥有的不是伯乐相马的眼光或某种资历，而是勇气和担当。这里，“经济”除了国民经济及经济基础的含义外，我们还赋予它经国济民这一内涵；我们把“管理”从制度化、规范化扩展到文化管理范畴。这样，“经济”、“管理”和“文化”三大板块漂移到一起，叠加、交融、崛起，以形成世界屋脊的形式横空出世。

《中国经济与管理》丛书内容包括经济生态、公共管理、实践前沿、文化生态、他山之石等。我们不画地为牢戴着脚镣跳舞，栏目设计本着大体则有、具体则无的原则。内容或原创，或选编，从宏观到微观。可以是有套路的“少林功夫”，也可以是“一剑封喉”的独门绝技；可以是经国济世之大计，也可以是组织谋生之道；可以是社会价值坐标，也可以是人生哲学；可以是高手“华山论剑”，也可以是草根“螺蛳壳里做道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我们崇尚探索、开拓、创新，立足于“建设”，同时不回避时弊，只要有益于国家利益和发展大局，没有敏感的话题与禁区。

高僧只说家常话。在表达方式上，我们不屑于虚张声势、故弄玄虚，摈弃陈词滥调、条条框框；追求举重若轻、深入浅出，追求花儿带露开般的鲜活。

《中国经济与管理》丛书集思广益，汇聚、萃取当代“诸子百家”在经济、管理和文化领域的研究成果，实践经验，人生智慧，人文情怀，以“精确制导”的方式传播，为中国经济与管理的主体和“文化人”开阔视野、提高决策能力、管理水平以及文化素养服务，为实现中国梦增添正能量。

选书读书如同择偶，盲目或不慎则耗费生命与精力。书籍浩如烟海，《中国经济与管理》中的文章（尽管有许多出自大家手笔）倘有一篇入你法眼，深感欣慰；有两篇心中窃喜；有三篇大喜过望，可引为知己；再多不敢奢求。

《中国经济与管理》丛书刚刚诞生，稚嫩不言而喻，“新生儿”需要呵护与教导，爱是你我。

厉以宁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曾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著有《消费经济学》、《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厉以宁自选集》等。

发展优势和“红利”的创造

厉以宁

一、如何看待原有“红利”的消失

所谓“红利”，实际上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发展阶段所具有的发展优势，以及利用这种发展优势所带来的好处。比如，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改革红利（或称体制红利、制度红利）都是发展优势及其运用所带来的结果。

红利的消失是指发展优势的消失。无论是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还是改革红利的消失，对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都应当被认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都会出现这种现象。原有的红利的消失并不是某一个国家特有的问题。

重要之处在于：经济发展方式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必须转变，如果原有的发展方式不能及时转换，那么在原有红利消失后，经济便会逐渐陷入困境。所以，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面临发展方式相应转换，发展战略有待于重新制定，以及产业结构及时调整等迫切问题。通常所说的经济转型正是这个意思。经济转型及时、顺利，这一关就闯过去了，否则经济将继续陷于困境之中，难以摆脱。

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不及时进行经济转型，或者经济转型不成功，经济长期停滞、衰退，就是教训。

可以这么说，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果认识不到经济及时转型的必要性，也就是如果只是留恋原有红利或优势而不愿尽力转型，那只会造成以下三个恶果：

第一，继续发展经济的信心丧失。认为既然原有的红利已经消失，发展的优势已经不存在，那就很难再有所作为了。

第二，由于信心的丧失，国内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者将会纷纷撤走投资，或者把企业迁移到较晚发展起来的国家，结果，国内投资总额减少，使本国经济的发展碰到投资不足的难题。同时，由于投资不足，与实体经济发展有关的专业人才也随着流向国外。

第三，由于本国实体经济空心化了，实体经济产业被投资者认为是没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大量资金转到了虚拟经济领域，使经济中的泡沫增加了，经济有可能陷入更深的陷阱中。资产泡沫的破裂，会使经济更加停滞不前，使以后的经济发展更加缺乏后劲。

二、从“旧人口红利”走向“新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因人力资源的存在而产生的发展优势及其体现。

但人力资源的优势在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会转换的。常见的情况是，在经济发展前期，一国或一个地区人力资源的优势表现为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此时，有四个就业条件适合于这些国家或地区廉价劳动力的运用，于是就出现了廉价劳动力资源所带来的人口红利。这四个就业条件是：

第一，国内自然条件合适于经营种植园，生产谷物、热带水果、棉花、橡胶等农产品，而国内的廉价劳动力大量存在，只要有人（无论是本国投资者还是外国投资者）愿意经营种植园，就不愁雇不到廉价劳动力。

第二，国内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铁矿石、有色金属、煤炭、石油天然气、稀有金

属、贵金属、钻石、宝石、建筑用石料等，有人愿意投资于采矿业，本地廉价劳动力的充裕供给可以满足投资者的需求。

第三，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前期，在制造业方面主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以轻纺工业、食品工业等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需要廉价劳动力作为工人，对他们的技术要求不高。这样，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稍加培训就可以适应投资者的需要。除劳动密集型工业可以吸纳就业外，大量个体手工业作坊和小商小贩的存在，也可以使劳动者获得就业的机会。

第四，建筑业在这个阶段有较快发展，也为廉价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如修建公路、铁路、港口设施、住宅、商店、工厂以及其他公用设施的建设，都使得廉价劳动力的使用带来红利。

上述人口红利是同廉价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和被使用分不开的。在发展前期，廉价劳动力资源的丰富成为生产成本低廉的主要依据。一些发展中国家正是依靠生产成本低廉而开拓市场，增加资本积累，进而使 GDP 逐渐由低收入阶段接近中等收入阶段，甚至迈入中等收入阶段。

然而，形势是会变化的。在那些逐渐由低收入阶段接近中等收入阶段、甚至迈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或地区，廉价劳动力资源的优势逐渐消失了，原有的人口红利也逐渐随之消失了。工资低廉不再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吸引投资者前来的独特因素。因为又出现了一些较晚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那里同样存在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而且他们的工资更低，生产成本更低，从而对外来投资者更有吸引力。加之，有些一直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而使收入已摆脱低收入阶段的国家或地区，多年以来忽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即不注意提高自己的劳动力质量，仍然以提供廉价劳动力为满足。这就使原来的人口红利下降了，最后甚至消失了，使这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陷入经济停滞的状态。这种例子并不少见。

怎么办？难道对今后的经济发展失去了信心？信心丧失能解决问题吗？这是一个对人口红利缺乏正确认识的问题。

要知道，一国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有适应于当时的人力资源优势。廉价劳动力优势和旧人口红利消失后，熟练劳动力优势将取而代之，新人口红利将成为发展新

阶段的特征，经济将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而继续发展下去。这是已有先例的。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应当有此信心。

再说，当人均收入不断随经济持续发展而上升的时候，特别是当人口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城镇化率越来越高以后，人口增长率一般都出现下降的趋势，于是开始出现人口老龄化和青壮年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下降的现象。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旧人口红利消失的原因。

对新旧人口红利的替代有了正确认识之后，让我们联系当前中国经济的现状作进一步的探讨。

既然红利的新旧替代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替代又是大势所趋，所以我们必须坚定信心，争取早日实现人口红利的新旧替代。

新人口红利是依靠努力创造而形成的。形成新人口红利要依靠四方面的努力，并且四者缺一不可。

一是增加人力投资，扩大职业技术培训，使工人的技术素质有大幅度提高。应当认识到，对中国来说，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就是技工时代的开始。廉价劳动力时代通常是同低素质、低技术水平、低效率的劳动时代结合在一起的。为什么劳动力廉价？这正与他们素质低、技术水平低、效率低有关。所以，通过增加人力投资而使越来越多的低素质、低技术水平、低效率的工人成为技术工人非常必要。这也是促进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提高产品更新换代的基本条件。

比如说，中国相对于周边一些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制造业企业的职工工资的确要高一些。所以，在中国，在以廉价劳动力为依托的旧人口红利退出历史舞台时，周边那些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则因廉价劳动力的存在而仍有旧人口红利。中国如果及时地以技工时代代替廉价劳动力时代，一方面，相对于周边后起发展中国家，中国将因进入技工时代而处于优势；另一方面，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技工的工资依然比较低廉，中国技工工资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同等技术水平的技工工资还需要一段时间，那么技工时代将让中国的发展具有自己的优势，新人口红利也将由此产生。

今后，当中国周边有些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转入技工时代之时，中国已转向高级技工时代、专业人才时代，优势依然存在。这同样要靠连续增加人力投资。为了导致新

人口红利的产生，连续增加人力投资是必不可少的。

二是要让已就业的和等待就业的工人有提高自身技术素质的积极性。这一方面取决于企业与职工双方都能认识到提高工人技术素质对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实现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企业与职工双方都认同工资应同绩效挂钩的重要性。如果职工工资不同绩效挂钩，只能导致许多职工认为自己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提高技术水平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这就有碍于他们向上进取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

三是改革现存的二元户籍制度。在现存的二元户籍制度的影响下，农民工的不平等待遇是阻碍新人口红利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主要是因为农民工在权利上遭到限制，甚至在某些方面还遭到身份歧视。在这种处境之下，有些农民工会对自己的前景感到失望，他们刻苦学习的积极性也就减退了，消失了。

四是在鼓励职工钻研技术，提高工人自身技术的同时，还应当对职工进行刻苦耐劳的教育，说得更确切些，应对他们进行职业道德的教育。中国的职工一直以勤劳著称，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认真劳动，在本职岗位上发挥自己严谨的作用，因此受到商界的积极评价。一些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的外商（包括“走出去”的中资企业）都认为宁可用中国工人而不用当地的土著工人，因为中国工人吃苦耐劳、守纪律，工作时一丝不苟。

从上述四个方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中国新人口红利的产生完全是可以期待的。

在这个问题上，应当重视小微企业在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对技工的培养所起的作用。这里所说的小微企业，是指自行投资、自主创业的小型微型企业，业主本人往往就是熟练工人、高级技术工人。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70年代，最早的蒸汽机、机器设备、铁路运输车辆（机车和载人载货车辆），都是前所未见的。它们是谁最先设计并制造出来的？主要是手工作坊的小老板或熟练手工工匠，如水车匠、钟表匠、磨坊匠、唧筒匠等人。手工技艺是家传的，或者是以师傅带徒弟方式、师傅手把手地教出来的。这样，久而久之，熟练工人数就会越来越多，他们的技艺会越来越好。举办职业技术学校，那是后来的事情。直到现在，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在西方发达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家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它们不但缓解了就业问题，而且它们还是大型企业的合作伙伴，为后者生产零部件，等等。许多小微企业以自己的技艺为长，生产名牌产品，也向社会输送手艺高超的熟练工人，包括为特定的顾客订做商品的独特的熟练工人以及修理汽车、摩托车、游艇、其他家用电器的能工巧匠。因此，中国在转向“技工时代”的过程中，不要忽视小微企业在这些方面的作用。

三、从“旧资源红利”走向“新资源红利”

资源红利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淡水资源、草场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在经济发展前期，这些资源一般都比较丰富。以土地资源为例，经济发展前期可利用的土地数量一般都比较多，土地价格也相当低廉。这就是资源优势，其结果体现为资源红利。

但应该看到这些也许是旧资源优势。除非个别确实是地大物博的国家，资源红利会长期存在，否则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某些资源会越来越紧张、短缺，一定时间以后，原有的资源优势和资源红利都会逐渐消失。中国正是这种情况。

新资源红利从何而来？新的资源优势和资源红利都来自先进的科学、先进的技术，以及对这些科学技术的运用。自然界提供的资源，一般说来，总有用完的时候，只有智力资源、人才资源是无限的。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来自智力资源、人才资源。增加开发、利用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的投入，才能使科学技术越来越进步。一旦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落实于实际，新的资源优势就形成了，新的资源红利也就产生了。

在中国现阶段，如果海水淡化的成本降低了，这将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北方沿海地区可以运用淡化后的海水。当然，还有一些技术问题需要解决，如海水淡化后运输成本有待于降低，而且钢管易腐蚀，要经常更换。但这些问题可以解决。

又如，新能源的开发和应用、沙地的改良、草场牧草良种化等等都是有助于新资源红利产生的科研开发活动。

2012 年夏季，我率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考察组一行在内蒙古进行调研，感到内蒙古草产业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前景乐观，大有可为。草产业的功能：一是改良了

草场的土壤，绿化了环境，保护了生态，符合低碳经济的要求。二是草业企业培育适合内蒙古广大草场种植的新草种，使它们的蛋白质含量增加，使牛羊挤出的奶营养价值上升，有利于国产乳制品的品牌提升，销路扩大。新草业企业培育的新草还能大量节水，很受牧民欢迎。三是草业企业为了推广新草种，即扩大改良后的新草的种植面积，正在与牧场、牧民订立合同，双方共享利益，结果草业企业、牧场、牧民的收入都提高了。四是草产业企业正在向城市推广这种节水型的、延长城市绿化用草周期的草种，包括高尔夫球场使用的草种。这可以减轻城市的绿化成本，减轻高尔夫球场维护球场的成本。这个例子清楚地说明新的资源红利的产生过程。

在某些方面，新的资源红利是同新的人口红利，特别是同新的改革红利结合在一起的。

新的资源红利同新的人口红利相结合之处在于：没有大批科学研究人员、专业人才、熟练技工，就谈不上科技领域的新突破，也就不会出现新的资源红利，人才为本，资源优势就难以显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资源红利和新的人口红利相辅相成，谁都离不开谁。科研队伍和技术人员队伍的成长是新的人口红利的体现，也是新的资源红利产生的前提。

另一方面，无论是新的人口红利还是新的资源红利，都需要依靠新的改革红利才能由设想成为现实。这里要举一个例子，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

新的人口红利要依靠专业人才的培养，也要依靠庞大的熟练工人、高级技工队伍的形成。如果不对现行教育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不建设新的、有效的职业技术教育制度，如果不打通社会垂直流动和社会水平流通渠道，使优秀人才能脱颖而出，如果不重视教育经费在 GDP 中的比例逐步上升，怎能使专业人才、熟练工人、高级技术工人队伍迅速成长和扩大呢？

新的资源红利同样要依靠制度创新，依靠新的改革措施，也就是依靠新的改革红利、制度红利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具体地说，这需要进行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重点在于发挥科技研究人员、科技成果推广人员的积极性，并且能够从制度上保障科研与发展经费在 GDP 中的比例不断增大。

为了实现更多的科学技术领域内的突破，一是需要有更多的新发明，二是需要把

新的发明应用于经济领域，使这些科研成果在经济中产生效益。前者靠发明家，后者靠企业家，这两种人缺一不可。也就是说，社会需要有更多的发明家和更多的企业家，需要有更多的人加入成功的发明家队伍。成功的发明家，可能终身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创新工作，也可能在科技发明发现之后从事企业家的活动，他们自己创业，成为一名出色的企业家。这在国内国外都有一些成功的例证。

无论是发明家还是企业家，他们要取得好的业绩，必须有一个适宜于他们成长的制度环境。适宜于发明家、企业家的制度环境，是新的制度创新创造的，它们就是改革红利的体现。否则，新的人口红利或资源红利依然是一句空话。乔布斯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不在于他个人的聪明才智，也不在于他个人的魄力、勇气和决断，而在于他成长在一个适宜于他施展才能的制度环境中。那里有产权激励的体制，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还有比较完善的资本市场，于是在乔布斯的周围形成一支庞大的科研开发团队，整个团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这样才形成了技术创新的热潮。这正是我们从乔布斯以及类似乔布斯的新型发明家、企业家群体那里所能学习到的最宝贵的经验。

四、从“旧改革红利”走向“新改革红利”

从以上所述可以懂得，在新人口红利、新资源红利和新改革红利中，新改革红利是最大的红利，也是具有关键性的红利。

改革红利又称制度红利或体制红利。这是指通过改革，制度或体制得以调整，让制度或体制能释放出更大的能量，推动经济的前进。

每一项改革总是适应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当时的特定状况而出台的。改革的红利体现于消除了原有制度或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使经济继续发展、前进。以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来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建立，就是当时根据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而推出的三大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产生的巨大的红利，人们至今记忆犹新，中国经济从此迈入了新的时期。

比如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符合当时广大农民的心愿，他们的积极性被调

动起来了。几年之后，农产品丰富了，农贸市场上鸡鸭鱼肉、米面杂粮、香油等原来稀缺的东西都可以交易，有卖方，有买方，人数越来越多。又过了一段时间，已实行多年的粮票、油票、布票等票证取消了。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改革红利之一例。

又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农村的劳动力反而富余了，于是乡镇企业（当时仍称为社队企业）建立了。这些乡镇企业不需要国家投资，政府不拨给生产资料，也不包产品的销售，全靠乡镇企业自筹资金、自己组织生产、自己负责销售产品。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新的情况，即在火车上、长途汽车上，经常看到一些农民模样的人，有些还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手提大包小包。这些人是乡镇企业的推销员。他们带着样品和订单，风餐露宿，去推销自己的产品。不到几年，在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出现了一个乡镇企业商品市场，乡镇企业更加红火了。这也是改革开放初期改革红利的例证。

再如，20世纪80年代一开始，在深圳建立了经济特区，采取了新的政策和新的规章制度。国内其他地区仍然实行计划生产和计划分配，而深圳经济特区却可以采取市场调节方式。国内其他地区只允许有个体工商户经营，而深圳经济特区却可以有民营企业（尽管那时还没有“民营企业”的名称），并且雇工人数超过个体工商户的雇工上限（以雇工不超过7—8个人为限）却没有人来查封。这就是经济特区的特点。这同样是改革红利的体现。

正因为改革开放初期有了上述这些改革措施，带来了改革红利，所以8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新的气象。当时，大家对改革红利的体会是深刻的。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新一轮的改革启动了。民营企业的名称已被正式采用，各地都掀起了成立民营企业的热潮。一些有才干的年轻人，纷纷从体制内转到体制外，形成日后影响越来越大的“九二派”企业家。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改制也开始了，有些改制为上市公司，筹到了从不同渠道集聚的资本，进入大发展时期。中国的证券市场从1992年以后日益活跃，《证券法》在时经6年多的起草后，终于在90年代末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以高票通过，得以实施。虽然《证券法》还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但证券市场毕竟有法可依了。这是经济改革的重要成果。在农村，从80年代中后期起已开始涌现的农民外出务工大潮，使农村面貌发生重要变化。土地流转成

为不可阻挡之势，并且呈现多种形式，如转包、交换、租赁、入股成立专业合作社，推广“企业＋农户”模式等。规模生产、专业化、多种经营，相继成为各个地区农村的趋势。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不仅抵御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而且国内经济朝着健康的方向大踏步前进。这全是改革所赐，是改革红利或制度红利所赐。

但一轮改革措施实行了一段时期之后，改革带来的优势或红利总有越来越减少的趋向。这是难以避免的。道理很简单：在一定体制之下，改革措施总会有从适应当初的形势到逐渐不适应新形势的变化。任何改革都适应于某种客观形势，后来由于形势改变了，原有的改革效力递减也就成为必然。原有的改革红利逐渐消失，这是普遍现象，而并非只有中国才发生。

可以把原有的改革措施带来的优势或红利称为旧改革优势或旧改革红利。这里，新与旧都是相对而言，而不问有效期的长短：有的改革红利可能存在的时间相当长，有的改革红利可能只存在短暂的时间，这无非是因为形势变化的快慢不同。所以，当旧改革红利行将消失之日，也就是原有改革措施的优势潜力耗尽之时。

改革，就是制度调整。制度调整必须及时推进。继续推行新的改革措施，继续进行制度调整，才能保证新的改革红利或制度红利的出现。民间向来都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这是改革的最大动力。不继续进行制度调整，就是对民间蕴藏的极大积极性的漠视，甚至是压制。这正是改革支持者、倡导者的共识。

那么，就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改革而言，究竟应当首先抓哪些方面的改革呢？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建议，见仁见智，各有千秋。在我看来，以下四大改革，应当是具有关键意义的，即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市场化改革、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现分别阐述如下：

1. 城乡二元体制改革

计划体制当初建立时，有两大支柱：一是国有企业体制，二是城乡二元体制。这两大支柱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户籍分为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城乡被人为地割裂开来，城市和农村都成为封闭性的单位，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十分

严格的限制，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权利是不平等的，机会也是不平等的。在某种意义上，农民处于“二等公民”的位置。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开始，但这只是否定了城乡二元体制的一种极端的形式（人民公社制度），而没有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存在的实际状况。

时至今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已经30多年了，无论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协调社会发展、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使农民与城市居民政治权利平等的角度来看，对城乡二元体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都是亟需的。

因此，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以后，首要的、具有关键性意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是走向城乡一体化的改革，其中包括城镇化的推行、土地确权、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户籍一元化等改革与发展措施。这是关系到“以人为本”原则得以贯彻的大事，也是可以带来最大的改革红利的大事，切不可等闲视之。

2. 市场化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市场化改革一直在推行，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应当注意到，市场化改革距我们的目标模式仍有相当大的距离。为什么会有差距？主要是由于认识不足。

在经济生活中，要正确看待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的区别。正如一个人那样，如果这个人健康，一定是内生机制健全、完善，靠内生机制的调节就可以保持身体的健康。必要时也需要服药打针，这种外生力作用毕竟是辅助性的。经济生活同样如此。市场机制健全、完善，是基础性的。宏观经济调控虽然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但不能主要靠宏观经济调控措施来治理经济，否则就会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放在首位，使经济活动越来越受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配，而违背了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性调节的原则。

另一方面，要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赋予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利和地位，而不能依旧像过去那样视企业为政府的下属单位和附属机构，不让企业与企业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